

上古授时仪式与仪式韵文

——论《夏小正》的性质、时代及演变

韩 高 年

《史记·夏本纪》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秦汉以至清代，学者大多认为《夏小正》记“夏时”，为夏代之作。晚近以来颇有人怀疑其真实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①，尝试从揭示《夏小正》蕴含的仪式文化内涵入手，借以探讨其性质、产生年代和传播演变问题。作者认为：《夏小正》是用于授时仪式的韵文，从其中记载的星象、历法等内容以及其语言形式来看，它的产生年代应在商周以前。《礼记》中的《月令》及《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等类似韵文都是在《夏小正》基础上改造、附益而成。

一、《夏小正》文本的来源与仪式文化背景

上古时期，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关于时历和季节的经验。它们以俚谚的形式流传，后来为巫祝等“有识者”所总结，汇集而成《夏小正》一类的仪式性韵语。统治者据此安排农时、祭祀和其它活动，由此形成上古社会中的季节性仪式景观，即特定的季节性物候与社会生活中依次举行的各种礼仪呼应，并由此形成特定的生活节奏与社会心理。

农耕与祭祀都需要依时而动，所以在远古就流传着物候天象和时令方面的俚谚。之后这些俚谚逐渐由个别人集中起来，加以系

统化。进入阶级社会，统治者利用其权威垄断了这些总结经验知识的俚谚，通过它们“敬授民时”。《尚书·尧典》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敬授民时是上古政治的重要内容。不同的部族使用不同的历法，所以统一历法，也是当时部族结盟的一种重要手段。

观测天象和制定历法，关系到季节性祭祀礼仪和农业生产。垄断这些知识，就可以实现统治，并控制其它部落和民众。夏、商以来，按时节向农夫宣布农事及祭祀等事宜，也就成为历代统治者行政的常制。

《夏小正》就是授时仪式的产物，而《逸周书·周月》、《礼记·月令》、《管子·立政篇》、《吕览》十二纪首等文献，则是由《夏小正》演变而来。

《吕览·仲秋纪》说夏历八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沈颢民先生认为《吕览》“十二纪‘敬授民时，巡狩祭享’，即《中庸》‘威仪三千’之制也。知此旨，可以考威仪矣。《后汉书·礼仪志》曰：‘夫威仪，所以舆君臣序六亲也。……’此统治阶级利用‘敬授民时’，加以威仪统治人民耳。汉制虽未能与三代之制悉合，而因革犹可考也。”^②揭示了“敬授民时”的仪式文化内涵。这一古老的制度，作为重农主义思想下的国之急政，在秦汉以后，仍代代相传。

为便于向老百姓宣布和容易记忆，“官方”的月令辞大多沿用了农谚时谣的韵语形式。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上古“见鸟兽孕乳，以别四季”^③，“见禽兽之产，识春秋之气”^④，还属于直观性很强的“物候历”阶段。^⑤物候和节气的对应有的只是巧合，还有少数则纯出臆想。因此月令类的韵文在叙述和描写物候时，常常具有浓重的巫术色彩。这在客观上成为后世文学景物描写的滥觞。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小正》类的韵文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也具有文学价值。

这种情况还可以从民族学方面找到佐证。据载，彝族毕摩（巫

师或祭司)在重大的节日祭典上,常用树枝插出一个复杂的星图,吟唱有关节令划分、天象变化及物候运作等的古歌,并伴随着与天象有关的象征性舞蹈。不管这些星图的用途如何,准确性如何,也不管这些歌舞的幻化程度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先民所认识到的天文知识的传播常常和歌舞仪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在以口传文化或象征性文化作为主要传承工具的民族中,这些歌舞及“星图”,正是他们保存和传播“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手段之一。^⑥

晚近研究表明,彝族源出于古羌族群^⑦,与夏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彝族以歌舞传播天文知识的方式也可能传自夏商以来的古制。据《今本竹书纪年》载:

(夏禹)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

《今本竹书纪年》是晋以后人根据春秋战国以来的相关史料及《汲冢竹书》残本重辑而成,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上引材料代表了战国以来的人对相沿已久的授时仪式制度的追述。《国语·周语》载单子论陈国之政违犯先王之令——《夏令》,故有亡国之相。所引及之《夏令》,内容与《夏小正》颇为相似。据此,上引《竹书》所载夏禹“颁夏时”——即举行敬授民时仪式,应有所本。

《国语·楚语》载申叔时论教太子,曰“教之以《令》,使访物官”,《集解》云:“《令》,先王之官法、时令也。”即《夏小正》之类。可见《夏小正》用于仪式,传之口耳,为记诵之便,故全文押韵(详见后文)。这是仪式诵辞的普遍特征。所以本文认为,先秦时期传为记载夏历的《夏小正》,就是夏代颁布时令的“仪式诵辞”。

二、《夏小正》的产生年代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所见,夏朝时已有较科学和实用的历法。所以《夏小正》所载“夏时”所达到的水平是无庸置疑的。而对其中星象年代的推算结果也大体接近夏代。由此可以证明《夏小正》的产生时代。

《夏小正》这一古老文献,汇集了时历农事的谣谚俚语,将其分属十二个月,以说明各月的物候、气象、星象和相关的农耕、渔猎、蚕桑、畜牧业等情况。关于其产生时代,据《礼记·礼运》等文献所载,为孔子得于夏人之后的杞人。孔子认为其内容当属夏代原有。^⑧这个看法大体可信。

《夏小正》全文共记载天象、物候、农事、生活等共124项。其中记录星象共21项,清人王聘珍用岁差逐一推论这些星象位置,发现全部21项记载中,只有一项不符,一项误夺,一项方向偏差45度,其余的全部符合夏代星象。^⑨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夏小正》经文中给出的星象共计有17个,将其分为昏旦南中、伏见和星座指向3部分,通过天文计算,分析其使用年代,结论是:《夏小正》中各星象的年代是一致的,该历曾被用于周代,其起源可以上推至夏代,但确认后者还需要其它方面的证据。^⑩虽然不能确凿地肯定《夏小正》为夏代原作,但至少可以肯定其内容有古老的来源。

《夏小正》所记载的天象物候,还可以从考古发现得到证实。夏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学术界大多认为主要在今河南省西北部和山西中南部,陕西全境及甘肃;其发展的方向似乎是从山西南部向河南和陕西方向移动。^⑪在这一地区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新石器遗址有: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个地区的这三种文化类型,是我们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夏族活动区域地处黄河中游,这里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期,就出现了农业。到仰韶时期,这里的农业进一步发展,农作物的种类较前更多。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和气候的依赖性很大,所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人们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许多陶器,上面的彩陶纹饰上绘有与天文星象有关的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日珥纹等图案。其中太阳每器十二个,专家认为即表示一年有十二个月。月亮有圆月与新月两种,这种图

纹说明当时人们对月亮盈亏的不同月相变化已有认识。^⑫《列子·汤问》:“大禹曰: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大禹是否说过这话,难以查证,但夏代已掌握了这些历法知识,是完全可能的。《夏小正》正是分一年为十二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可以相互印证。

此外,1987年,在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一批距今约4500—5000年的精美玉器。其中一件刻有特殊图案的长方形玉片,引起了科学家的兴趣。学者们认为这与汉代纬书中所说的“元龟衔符”、“元龟负书出”、“大龟负图”等传说有关,这是一套人们从未见过的与天文历法相关的史前占卜测量仪器。^⑬事实上它来源于一种最古老的斗建授时的传统。^⑭《夏小正》中所用的正是斗建记时法:正月启蜚,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织女正东向,斗柄悬在下,则旦;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九月内火,辰系于日;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夏代历法在天文授时上采用了斗建纪月、岁星纪年两套授时系统。既用了赤道星空,又利用了极地星空。《夏小正》的历法,与含山玉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也有专家认为,含山玉版是一块记载季节与星历的上古历法图。但无论哪种说法,从中都可以看出,夏历的水平并不象有些学者说的那么低。既然含山玉版历法图反映的是我国夏代或先夏的律历制度,那么就不能无端地怀疑《夏小正》内容的真实性。^⑮

《夏小正》的时代还可以从其语言形式得到证实。《夏小正》“文句简奥,实三代之书”(李调元《夏小正笺·序》),“三代之文唯夏后氏为最古”(王叔琳《夏小正序》)。其语言形式和语法现象较传世的商周文献更原始。《夏小正》全文押韵,其中的一些谚语性质的句子,又见于《诗》、《易》,可以看出是汇集了俚谚歌谣的基础上形成的仪式韵语。

今本《大戴礼记》之《夏小正》文本，明显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经”，经文后解释说明性文字为“传”。前人据《隋志》误以《夏小正》之经为戴氏所撰，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引《大戴礼记·夏小正传》云：“《大戴礼记》旧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无其传，戴德为之作注，遂自为一卷。后卢辨作注，始采其传入其经文下，《隋书·经籍志》所谓戴德撰者乃传也，当误传作撰。”这一点清人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也已经指出。^⑩这两类内容，一是关于夏代情况的原始的传说，它比较简单；一是后人所加的解释，其体例与文句类于《公羊传》，可能是汉代经师所论，《史记·夏本纪》谓“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这后一类内容应当是传授时所加。

《夏小正》虽未必为夏代写定之本，可能经后世润色，但作为夏代以来颁布月令农时的仪式诵辞，其语言形式仍保留有原始性的痕迹：

第一，其句式方面，多以二言、三言、四言为主，显得比较古朴。尤其是多达25句的主谓倒句，在商、周文献中十分罕见，经一些学者的对比研究，认为这种句式来自夏代，证明《夏小正》的语言十分古老。如正月的“缙缙”，“缙”为草名，即莎随、青莎草。“缙”为动词，意谓“发芽”。此句谓语动词在前，意谓“发芽莎草”。王聘珍问曰：“先言缙而后言缙者何？缙见者也。”是说先见其发芽而后识其为青莎。这是符合早期人们认识事物先从其具体特征入手的思维方式的。再如三月的“拂桐芭”，《月令》作“桐始华”。“拂”即“华”，就是开花。此句亦为主谓倒句。类似例子甚多，不繁举。这类句式零星见于《商书》、《易》、《诗》等文献，绝不见于较晚之书。^⑪说明《夏小正》的确有较早的来源。

第二，用韵方面，分段来看，或韵或否，用韵处亦不规则，比较随意。但整体来看是韵语，全文大体上以幽部字遥韵。韵字如“韭”、“鸠”、“粥(入)”、“学”、“收”、“鸠”、“秀”、“秀”、“鸟”、“兽”、“狩”等。

第三，词汇古老。其中一些涉及时令、气候、天象、物候的词，属

于上古所特有。如九月之“嗇人”，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即是“嗇夫”^⑧，又见于《夏书》：“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左传》昭公27年引，又见《尚书·胤征》），知其来源甚早。

另外，其中的一些对物候的认识，具有巫术的色彩，如“田鼠化为鴽”、“雀入于海为蛤”、“玄雉入于淮为蜃”等，也体现出人们认识水平尚处在较低的阶段。

三、《夏小正》的传播及演变

三代重“礼”，礼表现为各种仪式，而仪式是联结和整合上层社会与乡民社会的最有力的手段。上古时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秋收，依时而动。农耕文化的节奏感决定了仪式的季节性。反过来说，季节性仪式构筑了上古人们的生活内容，并决定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仪式韵文依附于季节性仪式文化景观，当后者发生变化时，仪式诵辞在形式和内容上也会发生适应性的变化。但从夏到周，作为生活主要内容的季节性仪式并无多大变化，相反却因农耕生产方式主导地位的确立而得到加强。所以《夏小正》一类的仪式韵文为商、周所继承，仍然发挥着指导农时、规范生活的作用。当然，在内容和传播方式方面作些调整以增强其适用性，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柳田国男《传说论》一书用大量实例证明口传韵文介于历史和文学两极之间的性质。口头传说虽然会随生活方式的变化而被后来者改造，刻上新的生活方式的印迹，但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⑨

诚如一切口头传说那样，《夏小正》在其基本内核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经历“润之以新辞”、“涂以新的色彩”的过程。从《夏小正》到《礼记·月令》，再到《吕览》十二纪首的演变系列，就是如此。

历法的颁行虽然由统治者掌握，属于大传统的范畴，但某种历法一旦在民间使用，就又以小传统的形式存在于民间。甚至于在大传统消亡之后，它还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周人重农，加之周族

在族源上与夏的密切关系^③，所以周人沿用夏时，除杞人之外，至春秋夏时仍在一些地区使用。因为夏时易于掌握，便于安排农时，所以为孔子所称道。^④

大传统在演变为小传统的同时，其中的合理因素亦为新的大传统所吸收。《夏小正》可能通过这种途径传至后世。《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太史所载之“图法”，即作为大传统的图录和法典，其中亦包括《夏小正》一类的东西。周初沿用夏代文化制度，历法亦不例外。据《国语·周语中》载：

单子归……对曰：“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待而畚揭，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陈国火朝觐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

这段材料本是单子论陈之政的话，单子引述其九月、十月部分的内容，说明陈国将亡的原因是“火朝觐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即违背了“先王之教”——《夏令》。韦注：“《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这部《夏令》和《夏小正》在内容上有相似之处。其中“其时儆曰”的“儆”字，表明这是行政者告诫民众之辞，故可称为“令”。

经过阴阳家附益的《礼记·月令》完全体现了“令”的特点，显系因袭改造《夏小正》而成。《逸周书·周月》：“夏数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王，至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是周人沿用夏时。

《逸周书·月令》很早散佚,无从知其原貌。论者多以为即今《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这几篇文献内容大体相同,当中以《月令》最古。其它文献,都是抄《月令》。据日本能田忠亮和中国学者潘鼐的研究,《月令》与《十二纪》中记载的星象,除二、三项误记外,其观测年代当在公元前620年左右。^②从天文星象观测年代的推算可以看出,《月令》是因袭《夏小正》而成。这个结论与文献所载也颇为一致。

《夏小正》的内容侧重于天象物候和农事及日常生活,偶尔涉及祭祀。《月令》则明显以祭祀和政教为中心,体现出夏、商文化的不同特点。但二者又有很多相同,则表明后者对《夏小正》物候的继承。郑玄《礼记》注指出《月令》有9处直接引用了《夏小正》。^③这是指二者文字完全相同者。除此之外,文字不完全相同,而相关内容一样的条目共有56条之多。^④

另外,十多条同样的物候,两者相差一个月。如《夏小正》正月桃则华;《月令》二月桃始华。这说明同样是春天桃花开放的物候,周代比夏代晚一个月。又如《夏小正》九月荣鞠,树麦;《月令》八月鞠有黄华,乃劝种麦。都是说秋天菊花开放时节劝说老百姓开始种冬小麦。但《夏小正》比《月令》又晚了一个月。这说明《夏小正》的时代,春天回暖早,秋天降温迟。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夏商时期是第一个温暖期,那时黄河中下游地区有野象等亚热带动物。西周到明朝初期为寒暖交错期。总体来说,在夏代,中原地区的气候比周代要暖和。^⑤这与《夏小正》物候的记录是相吻合的。由此可以证明,《夏小正》的确记录了夏代物候,周人继承夏时的《周月》(《礼记·月令》所本),在转录《夏小正》的物候方法时,根据周代的气候变化,作了一些相应的调整。^⑥

陈美东对《夏小正》及《吕纪》、《月令》的物候进行归类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吕》、《礼》文中的物候受到了《夏小正》的重大影响,直接承继者占1/3强。同时《吕》、《礼》文物候又有了巨大的发

展,其中以气象类的增加最为突出,从4项增至18项与从37项增至42项,二者所选用的具体动、植物象有较大差异,不同者分别为13项和19项,从而证明《吕》、《礼》文物候的发展带有创造性与突破性的意义。”^②《夏小正》记星象比较零散,《月令》及十二纪的记录则更加具体和成系统,每月都有。这说明后者对星象的观测较《夏小正》的时代有较大的突破。

沈颢民亦认为,战国末吕不韦召集门客编纂《吕氏春秋》,欲为秦之施政宪法,用夏时:

《吕氏春秋》十二纪用夏正。或谓周正,或谓秦制,皆非也。其所谓月者,皆依据节中,即《逸周书·周月解》所谓“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气以著……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以建丑为正。……亦越我周王,改正异械……以重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为十二纪用夏时之明证。注家皆昧其理,以为不韦所著,是用秦历,误之又误矣。^③

沈先生推论十二纪用“夏正”,也证明了《夏小正》与《月令》之间的源流关系。至于《月令》与十二纪中的阴阳五行内容,则出于战国中后期的阴阳家学者的附益。之后《淮南子·时则训》等,又是对阴阳家《月令》的继承。这一点前人已有详论^④,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夏小正》是用于授时仪式的韵文,从其中记载的星象、历法等内容以及其语言形式来看,它的产生年代应在商周以前。《礼记》中的《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等类似韵文都是在《夏小正》基础上改造、附益而成的。

注:

①《夏小正》渊源久远,历代有很多学者潜心研究。其版本源流方面,台湾的庄雅洲先生有详尽的研究。见其所著《〈夏小正〉研究》(台湾师范大学1981

年刊行)及《<夏小正>析论》(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根据现代科学知识对《夏小正》的经文内容加以系统考察的,有夏玮英《<夏小正>经文校释》和与范楚玉合著的《<夏小正>及其在农业史上的意义》(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李学勤的《<夏小正>新证》结合考古材料研究《夏小正》,开创了一条新路子。最具突破性的研究,当属国家“九五”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小正》星象年代的研究。胡铁珠的《<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是带有总结性的成果,对于确定《夏小正》的年代有重要意义。

②②②沈颢民:《读吕纪随笔》,《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11月版,第191-219页。

③③《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④乐史:《太平寰宇记·儋州风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⑤王昆吾:《火历论衡》,收《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6月版,第1-40页。

⑥⑥周凯模:《祭舞神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⑦⑦马学良等:《彝族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页。

⑧⑧《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礼记·礼运》篇引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认为孔子“得夏四时之书也,其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亦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此《小正》即今本《大戴礼记》之《夏小正》篇。《隋志》著录“《夏小正》一卷”,从此单行。迄有清一代,考据之学大兴,《夏小正》备受重视。据清末程鸿诏《夏小正集说》所集录,仅清人之治《夏小正》者,就有四十余家(参于省吾《夏小正五事质疑》,《文史》第四辑,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5-150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大戴礼记》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连具有疑古倾向的四库馆臣也肯定其古老性。

⑨⑨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二,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⑩⑩徐旭生:《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三联书店1961年12月版,第155页。

⑪⑪胡铁珠:《<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第3期(2000年),第234-250页。刘次沅:《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天文学问题》,刊《天文学进展》2001年第6期。

⑫⑫参郑州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

期。《谈谈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的天文图象》,《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⑬玉版呈长方形,剖面略呈拱形,长11厘米,宽8.2厘米,通体呈黄色,内外两面精磨,其中三条边磨出榫沿,且两条短边各钻有5个圆孔,一条长边钻有9个圆孔,在没有榫沿的一条长边钻有4个圆孔。玉版正面雕琢有复杂的图纹,中心部位刻有两个同心圆,圆中心是一方八角形图象。两圆之间以直线均分为八区,每区内各有一枚叶脉纹矢状标分指八方,外圆之外又有四个矢状指标指向玉版四角。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由背甲和腹甲组成的玉龟,均呈灰白色。出土时,玉版夹在玉龟之间。详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⑭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研究,玉版外方内圆,象征地和天。中心的八角形和两圆之间的八个区域和玉版的中心区域,合起来构成的图形象征九宫八方,大圆外的四个矢状标指向象征天地之间的四维。八方与分至启闭八节始终是相互配合,八节则是不同季节来自八方的不同之气,北方冬至,东北立春;东方春分;东南立夏;南方夏至;西南立秋;西方秋分;西北立冬;最后以太一北斗居中。太一北斗既是北辰的天神,又是主气之神,它的所居就是太一宫,也即九宫中的中宫,天文学上相当于紫宫。太一按一定次序行移于八方之宫,建定八节,这便是太一下行九宫的道理。详参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370-394页。

⑮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度考》,《文物》1989年第4期。

⑯颜景常:《〈夏小正〉里的主谓例句》,南京高师学报1997年第3期。

⑰说见《〈夏小正〉新证》一文,刊《农史研究》第8辑,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又收《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⑱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4页。

⑲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65岁论文集》,1933年1月。

⑳《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武)……’”。

㉑能田忠亮:《礼记月令天文考》,《东方学报》1941年。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1989年版,第13-16页。

②孔颖达:《周礼正义》引郑注,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④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⑤谢世俊:《中国气象史稿》,重庆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169页。

⑥《周书》有《周月》篇,今佚。

⑦陈美东:《月令、阴阳家与天文历法》,刊《中国文化》1995年秋季号,第185-195页。

⑨参容肇祖:《月令的来源考》,原载《燕京学报》第十八期,1935年出版。收《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78年版。杨宽:《月令考》,原载《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收《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